



马海德：此生无憾为中华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生于美国，祖籍黎巴嫩。

1933年，马海德在欧洲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到上海考察东方热带病。当他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时，命运随之改变。

1934年秋，马海德有幸结识了宋庆龄，在她的鼓励下，马海德参加了外国进步人士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内有知名人士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

1936年，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熏染的马海德从上海出发到西安，最终抵达陕北。在陕北，马海德发挥其医学特长，背着医疗卫生包救死扶伤，此外还作为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的代表，负责向宋庆龄提供当地医疗物资的需求报告，并参与物资接收和分配工作。

1937年，马海德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年，他将自己的名字乔治·海德姆改为中文名“马海德”。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加入中国国籍，1950年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投身于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开拓和建设中。

马海德致力于全国范围内的性病和麻风病防治和研究，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绩。

他将消灭麻风病定为奋斗目标。得知中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有不少人患有麻风病时，他长途跋涉，到山寨、草原宣传防治知识，经他之手治愈数以万计患者。

在国际交往中，马海德从个人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出发，生动介绍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在《中国建设》杂

志英文版上，马海德曾撰写《美国出生，中国成长》《在中国的新生活，重访美国》等文章，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

晚年身患癌症的马海德依然坚持日常坐诊，把服务患者放在第一位。1988年10月，他在北京去世。这年5月，他还在家中召开研究麻风病防治工作的会议，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参加会议。

他曾这样感慨自己的一生：“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我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些事，死也无憾了。”

马海德被授予“最美奋斗者”“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等荣誉称号，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据新华社上海6月2日电

爱泼斯坦：洋面孔 中国心

“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块书页状的石碑上，有这样一行文字。

说过这句话的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一位长着外国面孔的中国人。

1915年4月，爱泼斯坦生于华沙一个犹太家庭。两岁时，他随父母来到中国，先居住在哈尔滨，后在天津定居。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爱泼斯坦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战地记者生涯。天津、南京、武汉、广州、香港——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前线，他成长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始终坚定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战争暴行，讴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壮举。

1944年，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

社记者参加了记者团前往延安。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写的20余篇通讯在《纽约时报》发表，并收入《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该书于1947年在美国出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延安，他积极主动帮助那里的中国同行们。新华社的第一条英文电讯，就是经他改写后播发的。从此，世界开始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邀请，爱泼斯坦回到中国，参加新中国对外宣传杂志《中国建设》（后更名为《今日中国》）的创办工作。

爱泼斯坦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爱泼斯坦在自传里这样写道。

2005年5月，爱泼斯坦在北京病逝。妻子黄浣碧至今仍保存着爱泼斯坦当年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和入党申请书。泛黄的纸页上，一个个英文单词背后，是一颗火热的中国心。

“他一心向着中国，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名誉。”黄浣碧说，爱泼斯坦一辈子写的就是中国，他似乎就是为中国而生的，对中国爱得深沉、爱得清澈，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中国人一般从爱国主义走向国际主义，而我是从国际主义走向爱国主义。”爱泼斯坦曾用这样一句话，概括自己的一生。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南京路上好八连”：从“霓虹哨兵”到“特战尖兵”

孟夏时节，位于上海市宝山区的“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

“‘南京路上好八连’是我们上海的一张名片。”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退休干部陈龙华说。

1947年8月6日，八连前身——华东军区特务团四大队辎重连，在山东省莱阳县城西小园村组建。解放战争中，连队先后参加了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战斗。

上海解放后，连队随大部队进驻上海，改编为内卫一团二营八连，负责在南京路等地巡逻执勤。

“面对‘进城’这张考卷，组建不满两年的八连，在南京路考出了好成绩。”展览馆讲解员龚明辉说，“面对敌对势力的拉拢、十里洋场的诱惑，八连战士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没有被‘香风毒雾’所侵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八连身处繁华都市，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

风，逐渐形成了“节约五个一”“四个自己动手”等优良传统。木工箱、补鞋箱、理发箱“三箱”传家宝由此产生，并传承至今。

1961年，沈西蒙、漠雁、吕兴臣等以八连为原型创作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观看了话剧。毛泽东号召全军向八连学习，写下诗篇《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

1963年，八连被国防部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第二年，根据话剧改编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全国公映。

随着使命任务的改变，八连不再担负在南京路执勤的任务，但他们的身影并没有从南京路上消失。每月10日、20日是八连的“为民服务日”。从1982年开始，每逢这两天，八连官兵都要来到南京路，为居民免费理发、

补鞋、磨刀。从1983年开始，八连与南京东路街道云中居委会30多位孤老结对帮扶，定期上门为民服务。

2017年，八连换装转型成为一支新型特种作战力量，不到一年就完成了从“霓虹哨兵”到“特战尖兵”的转变。转型以来，八连出色完成进博会安保等任务。

自命名以来，八连取得的主要荣誉有100多项。2018年，八连被集团军评为“基层建设标兵连队”；2019年，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2020年，被评为陆军“四铁”先进单位。

如何在新时期赋予八连新的时代内涵，是政治指导员王鸿绪来到连队就一直思考的问题。

“为人民，是八连精神的核心之一。”王鸿绪说，“服务社会，奉献爱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我们不能忘，但如今我们更要苦练特战本领，用胜利和打赢为人民保驾护航。” 据新华社上海6月3日电

胡福明：实践出真知

胡福明，出生于1935年7月，江苏无锡人，荣获“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

1976年秋天，“四人帮”倒台，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当教师的胡福明和同事们一起庆贺。然而，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这等于给揭批‘四人帮’的热潮泼了一盆凉水，等于回到了‘文革’老路上去。”胡福明很吃惊。

但他也很快意识到，抓住了“两个凡是”，就抓住了批判“四人帮”、批判“文革”错误路线的靶子。然而，胡福明感到心里没底。1977年初，犹豫了一个多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最终占了上风，胡福明暗下决心开始动笔。

1977年夏天，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院。去陪护时，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带到医院， 在医院的椅子上草拟文章

提纲。妻子出院时，文章提纲也大致写成了。9月初，胡福明将8000字左右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编辑部。

1978年1月，胡福明收到了编辑来信。后经反复共同讨论和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于第一版，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文章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次日全文转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谢高华：顺民意开放义乌市场

谢高华，1931年出生，浙江衢州人。1982年5月至1984年12月期间任义乌县委书记。

当时的义乌是“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的贫困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经包产到户的义乌农民开始从事各种副业，在城里逐渐自发形成小规模的路边摊市场。当地一些部门因上级对能不能搞商品市场还没有明确定论，仍把这些路边摊市场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打击。

1982年6月的一天，在县城摆摊经常被有关部门“围堵”的农户冯爱清，在县委机关大院外拦住了谢高华，责问政府为什么不让更多百姓摆地摊。当时，谢高华到任义乌才一个多月，冯爱清的话让他深受触动。

谢高华开始对义乌群众摆地摊等经商情况进行调研，又带队到温州考察，越调研越觉得搞活市场符合中央的精神原则，政府要顺应民意给地摊市场松绑。

在当时历史环境下，要为市场松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地不少干部怕担责任，顾虑重重。对此，谢高华在一次县机关大会上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1982年9月5日，义乌县委作出决定，开放稠城镇湖清门小商品市场。一时间，周边县市被“围堵”的摆摊人像潮水一般涌到义乌。在此基础上，义乌县委、县政府又发出“四个允许”通告：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进一步为城乡经济松绑。

1984年，谢高华结合义乌实际首创“兴商建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带领全县干部勇敢坚持、积极作为、精心培育，从而催生了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的改革发展树立了榜样。

“他开创的良好营商环境，是义乌成功的一大秘诀。”谢高华曾经的同事、金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守

春说，谢高华眼里只有工作，工作特点就是吃透上头精神实质，潜心研究当地实际，创造性地贯彻上级指示，干出地方特色。

《义乌不能忘记谢高华》一书的作者之一何建农说，“要致富，到义乌”成了当时各地供销人员的口头禅。谢高华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义乌历届班子接力探索、继续奋斗，成就了今天的义乌市场。

1995年，谢高华在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休。富裕起来的义乌百姓也从未忘记他，从1995年起，每年的义乌小商品博览会期间，众多市民自发组成车队在义乌高速公路出口处，举着横幅、手摇拨浪鼓欢迎谢书记“回家”，以此表达感激之情。

“飞鸡毛引银练无愧先锋，生于斯长于斯情系金衢”。2019年10月23日，谢高华因病抢救无效，在杭州逝世，享年88岁。灵堂现场，这副挽联概括了谢高华的一生。 据新华社杭州6月5日电

小岗村：18枚“红手印”撼响“惊雷”

时值夏收，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高标准农田里麦穗金黄，笔直宽敞的马路上车水、农机川流不息，林立的徽派小楼中乡村振兴银行刚刚挂牌，客户络绎不绝。

40多年前，这是一个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山乡巨变，要从当年18位庄稼汉的“红手印”说起。

1978年，安徽遭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农田布满裂缝，土地撂荒，农民外出乞讨者不计其数。在那个“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年代，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年挣的工分只能分到百把斤粮食。

饿怕了的小岗人心里明白，想吃饱饭，必须分田单干！1978年冬夜，小岗村一间破旧茅草屋内，18位庄稼汉托孤求生、立誓为盟，签订“秘密协议”，按下鲜红手印。

这张“生死契约”作为改革开放的珍贵文物，如今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实行“大包干”后，1979年小岗生产队迎来大丰收，粮食总产量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产量总和。

18枚“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状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严宏昌、严金昌、关友江、严立华……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起“大包干”的18位庄稼汉，如今只剩下10位，多数已年逾古稀。

随着时代的变迁，小岗人发现改革不会一劳永逸，必须将“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不断传承发扬下去，面对新变化新问题，攻坚克难、闯关破障。小岗村先后在安徽省率先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试

点、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等，让村民从“户户包田”到实现对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股”。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合作范围的扩大，小岗村集体经济来源越来越广，收入也“芝麻开花节节高”。2016年至2020年，小岗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169元跃升至276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680万元增长至1160万元。

小岗村党委副书记严云山是“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的儿子。在外打拼多年后，2014年他辞掉了收入颇丰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家乡发展。在他家客厅，摆着一块小白板，一些关乎小岗发展的“金点子”他都提笔记下。

“纪念父辈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改革。”严云山告诉记者，当年的那一记“惊雷”如今依旧回响。

据新华社合肥6月4日电

袁庚：改革精神照后人

袁庚，1917年4月23日出生，广东宝安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在东西两岸和港九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曾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军事教员、联络处主任、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第四野战军炮兵团团长。1949年后，曾任中国驻雅加达领事。

1978年，袁庚担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随后在深圳创办蛇口工业区，并进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探索，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区的雏形”。

“那时候的蛇口真可以说是穷乡僻壤，淡水只有两口井，经济发展硬件、软件的基础都很薄弱。”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部原总经理梁亮回忆。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任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等共产党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勇于担当的作为，炸响改革开放的“开山炮”。

1979年8月，蛇口工业区首项工程蛇口港开工。袁庚开创性地打破大锅饭，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工人们干劲大增，工程进度迅速推进。工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做法，渐渐成为中国内地企业普遍采用的重要激励机制。

正是在袁庚的大力推动下，蛇口在短短数年期间启动了从打破“大锅饭”到招商引资、从住房商品化再到全国人才招聘等一系列重大改革。

1984年，国庆35周年庆典活动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的蛇口工业区彩车，亮相天安门广场。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曾表示，1983年他南下深圳之初“不知道要干什么”，当听到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之后，有了创业的激情。

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回忆，如果没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响亮口号的提出和数十项全国首推的改革举措，当年的深圳断然不会产生

招行、平安、华为、万科等一批日后被证明带有优质市场化基因的企业。

在梁亮看来，这些企业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它们从一开始便实行了现代企业制度。”

蛇口工业区的探索起步，揭开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序幕。

40多年来，从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至2020年的2.77万亿元，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五位。

在盘点了全球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之后，英国《经济学家》用“若干成功典范中最突出的一个”来形容深圳。晚年的袁庚，常常请司机带着他在蛇口港区、赤湾港区和妈湾港区沿路看下去，带着欣喜和满足。

2016年1月31日，袁庚因病逝世，享年99岁。2018年，袁庚荣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荣获“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据新华社深圳6月5日电